文史哲

2026年11月6日
星期五
责编 潘玮倩
美编 肖　莎
校对 马曼婷

开卷小识

这是一条古河 却又是新的

2026年，清华大学文史哲建系百年。回望来路，不妨从一次出发说起。

1927年秋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赵元任南下江浙，调查吴语。他与助手辗转江南两个多月，访问200多人，调查33个方言点，记录63名发音人的语言材料。次年，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出版，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。

此行不囿于故纸，问学于天地，在古今中西的交汇处开辟新局，正是清华人文传统的缩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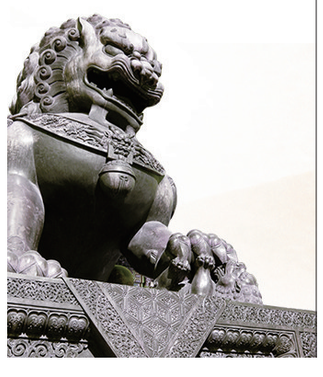
1926年，清华设立国文、历史、哲学诸系。此后历经抗战南迁；1952年院系调整，建制中断；改革开放后相继复建。筹建中文系时，王瑶先生叮嘱：清华文科是“复办”，不是“创办”。他借周作人的话说，这好比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，多年后又在下游被掘出，“这是一条古河，却又是新的”。

本期文史哲周刊头条，陈平原先生由清华、北大的交往与师承，写到学术传统的延续，再望向AI时代：前路没有现成的地图，大学之“大”，在于“有容”。

目光移向中国南部海岸。李晶笔下的潮汕文学，同样讲述着传统的流转：红头船载人远赴南洋，侨批、祠堂与老厝牵系着游子与故园；《归潮》里的香炉串联起几代人的记忆与和解，《走仔》里的女性则走出了故乡，由守望者成为新的出发者。

河水流过千年，仍有新的支流；乡人远行万里，也能带回新的故事。记住来处，方能赓续；不囿故常，乃得日新。

统筹：温建敏
执行：潘玮倩



互为镜像 有容乃大

——为清华大学文史哲建系百年而作

□ 陈平原

最近几年，我有幸多次出席清华大学主办的纪念活动，比如2018年11月24日的“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”、2019年11月23日的“闻一多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”，以及2025年9月9日的“中国主体，世界眼光——清华国学院的百年历程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学术研讨会”，重读那三篇初刊《人民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中华读书报》的发言稿，自认为都是感情真挚且言之有物的。因此，我才会不无得意地称，凡清华的重要活动，我都是召之即来，且认真准备。因为，这是我导师王瑶先生，以及导师的导师朱自清先生长期工作过的地方。

兼祧两校，错位发展

王瑶先生晚年多次称：“我是清华的，不是北大的。”解读这句话，须明白其来龙去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王先生先后撰写了文情并茂的《念闻一多先生》和《念朱自清先生》二文。因撰文怀念师长，重温美好的青年时代，从21岁到39岁，这18年间，王瑶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不仅因其“青春年华”，更因其“名山事业”——出版于1951年的《中古文学史论》不用说，另一部代表作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，上册刊行于1951年，就连出版于1953年的下册，其完稿时间也是在1952年5月28日。此后三个月，王瑶方才转任北大教员。凡略为了解现代中国学术史的，都明白这两部著作的分量及地位。不过，无论中外学界，还是我们这些老学生，都一再确认，王先生既是清华的，也是北大的。放长视野，不仅王先生，王先生的导师朱自清先生，以及众多清华或北大的教授，其实都是兼祧两校的学脉与风采。

说到朱自清先生对于清华文科的贡献，不能不提1929年春他开设“中国新文学研究”，同年秋讲授“中国歌谣”。这两门让人耳目一新的课程，同时出现在“清华学校”转型为“国立清华大学”的关键时刻，并非偶然。这一切的背后，隐藏着一个重要推手，那就是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，第二年改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、教授的杨振声先生。《清华大学一览》（1929—1930年度）中的《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》，乃杨振声所撰：“中国文学系的目的，很简单的，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。为欲达到此目的，所以我们课程的组织，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，一方面参考外国的新文学。”继任者朱自清先生撰写的《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》（1931年），延续其办系理念，且打穿后壁，称如此定位是因别的大学注重整理国故，而清华从“留美预备学校”发展而来，中西合璧，更适合于研究并创造新文学。杨、朱两位北大毕业生这一思考与抉择，明显以北大中国文学系为镜像，既借鉴，又趋避，还试图超越。此后百年，北大清华两校以及两个中文系之互为镜像、错位发展，构成一幅神奇的图景。其中包括上世纪二十年代建系初期的借鉴，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合并，五十年代院系调整的分家，八十年代重建时的帮衬，乃至今日之携手冲刺世界一流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很值得认真观察、辨析的学术史现象。

一条古河，却又是新的

王瑶先生1986年9月26日脱稿的《念闻一多先生》，结尾突然冒出一句“近闻清华大学又在筹建中国文学系”，称此举让他浮想联翩。我在王先生客厅里，亲耳聆听他再三叮嘱原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，要向校方及公众说明，清华文科是“复办”，不是“创办”，并引了周作人《〈杂拌儿〉跋》的一段话：“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，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，这是一条古河，却又是新的。”因此，如何发掘并阐发老清华中文系的传统，便成了当务之急——这就说到今天学界熟知的王先生关于“清华学派”的论述。

在清华纪念闻、朱两位先生的会议上，王先生三次提及“清华学派”，而在撰于1988年的《我的欣慰和期待》中，王先生更断言：“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，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。”王先生将“清华学派”的特点概括为以“释古”为旗帜：“他们的治学方法既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，而是形成了自己谨严、开阔的学风的。”日后学者们越说越广，越说越细，越说越神，有非常合理的发挥，但也不乏过度阐释的，那样反而模糊了王先生论述的主旨，且忽略了他为清华重建中文系站台的潜意识。

老清华文科确实很有特点，也很有建树，但若将几乎所有曾在清华任教的名家都纳入“清华学派”，则又不尽合理。另外，学术史上的学派及其命名，绝大多数是史家事后追认，极少有当事人事先规划好的。换句话说，对于具体的学者及其同僚而言，可以有建立学派的愿望，但不宜自我主张且高自标树。因为，过早画圈，容易窒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差异、活力与可能性。

做AI取代不了的学问

北大百年校庆时，我说过一句传播很广的话：理想的大学是为中材定规则，为天才留空间。若不胶柱鼓瑟，这个思路，既适应大学及院系的管理，也符合具体学者的自我设计。即便学术背景相近，志趣相投，甚至声气相通，治学时的眼光、方法与趣味，依旧可能有很大差异。君子和而不同，学问取长补短，这才是学术共同体的理想状态。人文学者普遍追求思接千古、特立独行、守正创新，若过分强调捆绑式的“造大船”，可能压抑年轻学者的奇思妙想。在我看来，可以有团队作战，那样声势浩大，确实能提高“能见度”；但不该强求一律，应允许千里走单骑。到底是人多势众兵强马壮容易出成果，还是荒江野老促膝谈心更见精神，因时因地因人因题而异——既然不是板上钉钉，那就鼓励自由竞争。

之所以脚踩两只船，不愿意把话说死，是基于我对AI时代人文学发展前景的预测。前年11月，我在“庆祝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100周年大会暨创新发展论坛”做主题演说，谈及“我们正面临‘大学’这一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发生根本性蝶变的前夜”。去年8月，我主编的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，其中有这么一句话：“我理解的‘与AI共舞’，是在承认危机、适应变化的同时，坚守人文精神，保有人类的尊严与价值。”今年5月，我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之“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”分论坛作主旨发言，题为《做AI取代不了的学问》——单看题目，便晓得我的隐忧与追求。

谈及AI时代的阅读、思考与写作，我既再三阐发古老的“为己之学”，将其作为整个人文教育的根基；又特别强调人文学的具身性、个体性与独创性。那是因为，在我看来，“AI时代，以往需要长期培训才能进入的‘高宅深院’（专业、技术），其重要性越来越被idea取代”。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，对于人文学来说，真正意义上的“创新”，靠的主要不是国社科立项或团队合作，而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之后的“灵光一闪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越是好大学，越应该给人文学者提供自由探索的空间——有人众志成城，有人壁立千仞，尽可各行其是。

百年后，我们肯定杨振声、朱自清设计清华中国文学系课程时的高瞻远瞩，但请记得，朱自清“中国新文学研究”课程只坚持了不到五年。即便日后影响十分深远，但在筚路蓝缕阶段，屡遭挫折是常态。所谓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是有巨大的成本代价的，绝大多数探索者，其实没能等到太阳出来，就消失在漫漫黑夜中。尤其进入AI时代，对于人文学者来说，没有可依循的路线图，只能在抵抗中适应，再伺机突围。这个时候，谁也说不清哪条路是死胡同，哪条路日后将成为康庄大道，只能不断调整方向，摸索前行。若问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有何长处，我的回答是：除了个体的才华与勤奋，更重要的是制度设计，具体说来就是鼓励创新，允许试错，山高水长，自由发展。好大学之所以显得“大”，就在于校园的“有容”——有人引领风骚，有人抵抗潮流，有人异想天开，有人沉潜把玩，哪一天拨云见日，不管谁登上领奖台，大学都是赢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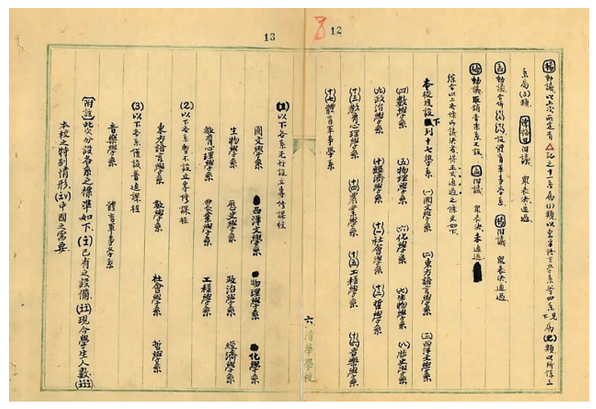
2026年10月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（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）



研究院 THE RESEARCH INSTITUTE

国学研究院部分教师合影。前排左起：李济、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；后排左起：章昭煌、陆维钊、梁廷灿。文图源“清华人文”公众号



1926年4月28日，清华学校评议会决定设立国文、历史、哲学等系（清华大学档案馆藏）。文图源“清华人文”公众号

漂泊与归途：潮汕文学中的“乡土”意象

□ 李晶



潮汕建筑 视觉中国供图

在地域文学的乡土叙事中，潮汕文学无疑是气质独特的一支。倘若说，中原文学笔下的“乡土”，是“守土扎根”，谱写的是“生于斯、长于斯、老于斯”的故园之歌；那么，潮汕文学的“乡土”，则恰似一位徘徊于出走与回归之间的游吟歌者。

中原文学的乡土叙事重在写“根”，写人对土地的羁绊与眷恋。“乡土”意象是麦田、老屋、祖坟、古井……而潮汕文学的乡土叙事重在写“渡”，“乡土”不仅是可供耕作的田野，也是远赴重洋的渡口，更是安放伦理根脉的精神原乡。人自故土扬帆启航，跨越山海后，又被家乡强大的精神引力召回。所谓“归”，未必是重返田园，更多指向精神层面的认祖归宗，兑现对家族血脉的承诺。其“乡土”意象是土地与海洋意象的叠加，是抬头便能望见的桅帆远影，是红头船、港口、侨批、祠堂、工夫茶……

樟林港与红头船：流动的乡土

潮汕平原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海，北倚莲花山脉，南濒南海。韩江、榕江、练江经年冲积，加之沧海桑田的海陆变迁，造就了这片滨海平原。潮汕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：“耕田如绣花。”因地少人稠，自古以来潮汕地区便形成了“绣花农业”：土地被划分为细碎的田块，套种多样作物。清代，生存压力驱使大批潮汕人背起行囊，备好甜粿、生活用品，从樟林港搭乘红头船扬帆出海，远赴南洋“过番”谋生。

据《人民日报》援引《汕头海关志》记载，1864—1911年间，由潮汕地区远赴海外谋生者，约有294万人。早在清代中叶，樟林港已是粤东最重要的出海口岸。作家厚圃在小说《拖神》创作谈中提到，“樟林是‘清代海上丝绸之路’的重要贸易港口，潮汕商帮、‘红头船’的历史和各种传奇故事萦绕着它，也贯穿了我的童年少年。”

小说《拖神》以“樟林港”为原型，展现了“樟树埠”六十余年的兴衰变迁。故事以鸦片战争为时代背景，讲述主人公陈鹤寿带领乡亲造船远航、下南洋开设船行、白手起家的传奇经历，书写了潮汕商帮的命运浮沉。书中描绘了一系列船舶的意象：下南洋的红头船、蜃民赖以维生的渔船、穿梭埠头的花艇、海上劫掠的贼船、往来群岛的暹罗船帮，还有西洋火轮等，勾勒出近代南海贸易的浩瀚图景。学者林培源在《小说如何书写社会史？——关于厚圃长篇小说〈拖神〉》中指出，“《拖神》不但写了樟树村的开埠史，还涉及了潮汕人下南洋的‘心史’、社会史。”

显然，在潮汕文学的意象图谱中，樟林港与红头船承载了族群的集体记忆，是乡土叙事标识性的精神符号，蕴藏着潮汕人闯荡世界、骨肉离别、跨洋寻根的多重隐喻，其意象的独特性在于“双向流动性”。红头船，船头朱红、绘有船眼，船体长达二十余丈，远航大船配有三桅：中桅高悬巨帆，上方再加叠帆，船头、船尾的桅杆亦各悬一帆。它一头连接樟林港，一头遥指南洋。红头船从不只是渡海的舟楫，更是“乡愁”的化身。而樟林港日复一日送走航船，也日复一日等候航船、侨批、归客的消息。

老厝与祠堂：跨越山海的乡土仪式

在潮汕文学中，老厝与祠堂是乡土叙事的核心意象空间。老厝代表“小家”，是烟火日常；祠堂象征“大家”，承载宗族记忆，是看得见的“族谱”，将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族人聚拢在同一血脉叙事中。

老厝常见建筑格局有“四点金”“下山虎”“驷马拖车”等，融木雕、嵌瓷两大潮汕传统工艺的美学精髓。木雕隐于梁柱厅堂，诉说家风伦理；嵌瓷装点屋脊檐角，寄寓乡土信仰。老厝天井敞阔，飞檐舒展，推门而入，便揽一院阳光。祠堂供奉祖先牌位，即便族人远渡南洋，也常在侨批中殷殷嘱托故土亲人修缮祠堂。

在作家陈崇正的小说《归潮》中，老厝与祠堂不只是生活场景，更是陈、林两家四代人的精神支柱。小说这样写道：“陈氏宗祠这一次的修缮始于三年前的那次台风，陈纯钢父子在这三年多时间里，除了应付生活必要接一些小单，全部时间几乎都扑在这上面。按照阿嫲林雨果的安排，宗祠必须在秋天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前完工。”

书中，陈氏宗祠与碧河书楼这一组空间意象，代表了潮汕人的归乡情结。“即便你没有来过潮州，也大概会在游客拍摄的照片里，看过梅花村的陈氏宗祠和碧河书楼，这两栋建筑隔着池塘遥遥相望，特别是在落日余晖之中，那些斑驳剪影和粼粼波光，就如洞箫与古琴，共同奏响时光的乐章。”这是小说开篇即描绘的场景。

故事以“香炉”作为核心意象，串联起陈、林两大家族四代人的命运纠葛。1922年，陈洪礼与林汉先结伴下南洋，寻找家族振兴的出路。身在异国，二人兴办华文学校、经营潮汕酒楼，追随侨领羽先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时光辗转，陈家后人陈乔峰与同为侨四代的黄博琳，在碧河书楼的一场婚宴上重逢。由此，尘封在家族记忆中的真相，伴随着古建修复缓缓浮出水面。

香炉的失而复得，撑起了《归潮》的核心意象。器物重归迎来了陈、林两大家族迟来的和解，也是潮汕文脉的传承。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乡土仪式，深层寓意突破了祭祀仪式的时空边界，延伸为一场漫长的历史回溯与精神还乡。

乡土中的人：过番、守望与归来

乡土文学的生命力，终究来自于人物的塑造。过番、守望、归来是潮汕人的命运轨迹，建构起潮汕文学的核心叙事。

“过番者”并非纵横四海的传奇英雄，而是背负家族生计的普通人。作家陈继明的小说《平安批》中的主人公郑梦梅便是典型：他人到中年远赴南洋，在异国他乡开设批局。抗战烽火漫天时，铤而走险开辟陆路邮路，于乱世中架起侨胞与故土通道，运送侨批、善款、抗战物资。从辞别故乡到闯荡南洋，郑梦梅的一生是潮汕人“身在天涯、根在故土”重情守义的生动写照。

与“过番者”遥遥相对的“守望者”，同样是潮汕文学不可或缺的人物群像。祠堂前静立的妇人、潮剧台下安坐的老者、日夜盼望游子归航的母亲，他们守护的不只是老厝与祠堂，更是代代延续的伦理秩序。

陈崇正在《归潮》中塑造的“守望者”，跳出了传统的悲情、隐忍的模式：人物守望的不只是游子，更是记忆与家族秩序，她们在创伤、误解与执念中坚韧地活着。小说中，林阿娥的丈夫林汉先客死南洋。在战火肆虐的动荡年代，她不惧路途艰险，执意护送丈夫的骨灰回归故土。与之互为镜像的，是“过番者”陈洪礼。林阿娥一直怀疑丈夫的死和陈洪礼有关。面对这份长久的误解，陈洪礼始终缄口不言，宁可扛下所有非议，也不愿道出背后隐情。他家境拮据，却数十年如一日暗中接济林家。

如果说，林阿娥守的是“追问与公道”，那么陈洪礼守的则是“乡愁与担当”。后来，林阿娥的女儿林雨果步入暮年时，远赴泰国寻访，在异国公祠里撞见一尊本应在陈氏宗祠里供奉的香炉，她认定是陈洪礼擅自将香炉捐出，心底的积怨变得更深。林雨果的守望，是创伤记忆的延续。她从小浸泡在母亲林阿娥的怀疑与伤痛中，上代的恩怨早已化作认知的底色。她要追溯的从不只是一件古物的去向，更是一份能够印证母亲的怀疑、安放家族伤痛的答案。直到后来，陈家后人陈锦桐苦心搜罗祖父陈洪礼的相关史料，倾力修缮碧河书楼，才用诚意慢慢消解了两家的隔阂。陈洪礼的骨灰终归故土，陈氏宗祠与碧河书楼也在修复中重焕生机。

林雨果的丈夫——木雕匠人陈团结，则代表了另一类“守望者”。他沉默寡言，一生固守老厝，小说这样写道：“陈团结一共有三样挣钱的本事：第一是画画，第二是竹篾编春盛，第三才是木雕。”临终前，他悄然雕琢出一件木雕，刻下与林雨果初遇的情景。可惜这份藏在木纹里的深情，在他离世之后，才被林雨果看见。

长久以来，潮汕文学里的女性形象多为静候归人的守望者，承受离别、隐忍等待。而作家黄守昙的短篇小说集《走仔》，则重塑了新南方语境下的女性群像，书写了她们在婚恋抉择、生育重担、家庭规训与传统观念夹缝中的突围与自我寻找。“走仔”是潮汕方言，意为女儿。《走仔》收录了十个南方故事，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叙事转向：女性不再只是原地守候，而成为主动抉择的主体。她们告别故乡，在漂泊与回望之间寻找自我；挣脱旧有身份枷锁，建立起独立的主体意识。当“走仔”成为叙事中心，潮汕文学由此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叙事路径。

在潮汕文学中，“过番者”以远行，“守望者”以坚守，“走仔”以回望，诠释了“乡土”的意义。这三类人物形象铺展出生生不息的图景：韩江的水流、红头船的帆影、工夫茶氤氲的香气、侨批斑驳的字迹、祠堂天井倾泻而下的日光，被一代代潮汕作家反复书写。潮汕的“乡土”意象是漂泊者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找到的回乡路，它从不只是一方平原与海洋，更是安放生命归属感的精神原乡。

（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人文学部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、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）